

北京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 及其影响因素*

易成栋 张 纯

【摘 要】文章利用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北京失业人口数量和失业率在功能分区、行政区和乡镇街道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失业人口出现了缓慢增长,但失业率有所下降;失业人口具有明显的本地户籍多、男性和 40~50 岁年龄段人口比例高、学历低的特征;失业人口在空间上相对集聚,集中在特定的街道,并且出现了相对分散的趋势,从以中心城区为主转向以郊区为主。2000 年失业人口高度集中的街道为市区国有企业改制下岗集中地区,2010 年则为郊区拆迁安置和保障房集中建设及工矿业衰落地区。劳动力供求总量、结构的转变是失业的重要原因,就业供求的空间不匹配和就业可达性差也对失业有影响。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就业供给方特征(街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就业需求方特征(街道劳动密集型岗位比例)、各乡镇街道到天安门的距离、外来人口和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比例对街道失业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

【关键词】失业人口 空间分布 北京市 空间失配

【作 者】易成栋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 纯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已经成为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了失业率的目标。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明确提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 以内,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5% 以内。2015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面对今年就业压力加大的形势,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2015 年北京市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北京面临调整转型、升级改造、搬迁改制或淘汰落后产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和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能,传统行业、低端企业的职工面临分流安置问题,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创业,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6 万人,促进 20 多万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现有政策大多以登记失业率为目标,但是,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存在一定的差距,后者能够更好地反映客观现实,而且这些政策忽视了失业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成因,存在一定的不足。

在理论研究中,Mouhammed(2011)发现不同流派将失业归结于不同的原因,包括经济系统的问题、失业者本身的问题、外来事件的冲击、技术和劳动力制度、总消费的不足、技术创新等。在城市经济学领域,Kain(1968)提出了空间失配假说来补充以上观点,认为劳动力供给方和就业岗位的空间错配及可达性差也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失业者的空间集聚。该假说认为,在城市的就业机会郊区化过程中,由于住房市场的歧视,住在市中心的黑人无法在郊区找到合适的住宅,为了工作必须承担较高的通勤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而导致市区黑人失业率较高。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和拓展了该假说,包括从市区居住地到郊区就业地的可达性差、就业信息的可得性差,以及白人雇主与黑人的社会距离远等,白人雇主和客户对黑人有一定的歧视,也导致市中心的黑人失业率较高(Gobillon 等,2012)。然而,Zenou 等(1995)的理论模型表明,失业人口在城市的空间集聚区位有多种可能。

从实证研究来看,失业人口的城市内部空间分布模式受住房、企业区位、交通、公共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城市可能存在差异(Gobillon 等,2012)。Zenou(2000)发现,美国市中心比郊区的失业率高,欧洲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因此,对失业人口的城市内部空间分布模式还没有定论。

中国的失业存在时间群集、空间群集、行业群集和个体群集(杨伟国,2006)。现有研究对中国城市的失业人口及其市内空间分布知之甚少。仅有薛惠元、刘玉娟(2005)根据武汉市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发现,城市内部国有企业集中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失业率较高。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缺少对城市内部失业人口空间分布的纵向比较;二是缺少对失业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导致无法准确分析劳动力供给方特征、需求方特征、户口、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选择北京为研究案例,并根据 2000 和 2010 年北京市人口普查资料长表分街道常住人口数据和失业人口数据,分析失业人口和调查失业率的空间分布,采取描述统计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失业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变化,检验空间失配假说,分析户籍、拆迁安置等因素对失业的影响。

一、北京失业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

2000 和 2010 年北京市人口普查采用了常住人口的概念,并且常住人口统计口径一致。在人口普查问卷调查中 15 岁及以上人口填报在业和非在业情况。在 2000 年,失业人口为 16 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并满足以下 2 个条件:(1)是否有工作填报选项为其他原因未工

作;(2)未工作者状况填报选项为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或失去工作目前正在找工作。这个定义比国际标准略宽(张车伟,2003)。在2010年,失业人口为16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并满足以下4个条件:(1)工作填报选项为在10月25~31日没有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1小时以上;(2)未工作原因填报选项不包括在校学习和丧失工作能力;(3)3个月内是否找过工作选项不包括未找过工作;(4)能否工作选项为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在两周内开始工作。这里与国际采用的失业人口定义一致。相应计算得到2000和2010年的失业率。具体计算公式为:失业率=失业人数÷(就业人数+失业人数)×100%。

根据2000年长表数据,北京失业人口为40440人,推算总人口中失业人口为416860人;依据2010年长表数据,北京失业人口为43068人,推算2010年北京失业人口总数为456706人;10年间总失业人口增加了39846人,增长了9.6%。失业人口总量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2000年北京城市总失业率为5.5%。2010年北京市人口失业率为4.9%,比2000年低0.6个百分点,失业率呈下降的趋势。北京人口失业率比同期中国总失业率低,也比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和都市区的失业率低。例如,199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5.2%,日本为3.9%,德国为7.8%,法国为10.1%,意大利为10.4%,英国为6.7%,加拿大为8.5%,澳大利亚为7.0%(张车伟,2003;Richarson,2000)。除了韩国(3.8%)、挪威(3.7%)外,2010年北京人口失业率低于大多数OECD国家^①,也低于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市区的失业率。例如,2009年10月到2010年9月英国伦敦的失业率为8.9%^②;美国49个大都市区的失业率在6.5%~14.3%^③。

北京市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高于常住外来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失业率(失业的常住外来人口÷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常住外来人口)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失业的常住户籍人口÷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常住户籍人口)。200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失业率为1.7%,本地人口失业率为6.6%,常住外来人口失业率仅为本地人口的1/4。201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失业率为2.2%,本地人口失业率为7.1%,常住外来人口失业率为本地人口的1/3。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王德文等,2004;杜鑫,2010)。

北京失业人口具有明显的年龄、性别和学历特征。对比2000年失业人口、在业人口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可以发现,失业人口相对年轻、男性和单身比例高、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低、非农业户口、购买经济适用房和依赖基本生活费比例高、出生以来或者5年前迁居到本地的比例高。2010年失业人口中,40~50岁年龄段人口比例最高,男性占比高于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低于在业人口(见表1)。

北京常住外来失业人口与本地失业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有所不同。2000年数据显示,前者更加年轻,男性比例低,单身比例差别不大,初中以下低学历比例高,非农业户籍比例

① OECD,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s: Key Tables, 2011.

②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f U.K., Local Area Labour Markets: Statistical Indicators, 2011.

③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Unemployment Rates for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2012.

低,居住在公房的比例低,依赖基本生活费比例低,出生以来或5年前迁居到本地的比例低(见表2)。

表1 2000和2010年北京不同就业类型的常住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 %

类 型	40~50岁 人口比例	年龄均值 (岁)	男性 比例	单身 比例	大专及 以上	非农业 户籍	购经济房 比例	基本生活费 占比	5年前迁移 到本地
2000年									
退出人口	9.0	57.53	39.7	28.2	16.5	71.3	1.90	2.8	76.0
就业人口	27.7	46.16	58.6	19.5	18.9	55.0	1.70	0.0	68.5
失业人口	22.0	41.63	54.9	34.7	13.1	81.5	2.70	15.0	74.8
总劳动年龄人口	20.8	50.05	51.7	23.1	17.8	61.7	1.80	3.9	71.4
2010年									
退出人口	20.1	-	39.3	-	31.8	-	-	-	-
就业人口	24.7	-	58.0	-	39.0	-	-	-	-
失业人口	31.5	-	56.9	-	38.0	-	-	-	-
总劳动年龄人口	18.6	-	50.7	-	36.2	-	-	-	-

注: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0.1%微观抽样数据计算,2010年数据根据201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资料汇总表计算。“-”表示无法得到相关数据。

表2 2000年按照户口分类的北京常住失业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 %

类 型	年龄均值 (岁)	男性 比例	单身 比例	初中 以下	非农业 户籍	公房 比例	基本生活费 占比	5年前迁移 到本地
常住外来失业人口	36.22	14.8	33.3	55.6	44.4	44.0	3.7	14.8
本地失业人口	42.02	57.8	34.8	41.9	84.2	61.4	15.8	79.2
失业人口总计	41.63	54.9	34.7	42.8	81.5	60.3	15.0	74.8

注: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0.1%微观抽样数据计算。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汇总表没有该项内容。

二、北京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

(一) 按行政区和功能区分是北京失业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

从表3总体情况看,2000~2010年,北京失业人口从在中心城区(城八区)集中发展到在城市近郊和远郊集中。从行政区来看,2010年失业人口数量最多的前5位为朝阳、海淀、丰台、昌平、通州;失业人口数量最少的5位为崇文、延庆、东城、怀柔、平谷。从四大功能分区来看,2010年失业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其次为城市发展新区,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失业人口数量较少,与总人口数量在各功能区的分布一致。

与2000年相比,北京市总失业人口有所增长,其中失业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昌平、通州、房山和顺义,减少主要集中在西城、崇文、宣武和东城区。从四大功能分区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失业人口在减少,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失业人

口在增加。

各区域失业人口的比较会受到区域经济活动人口总量的影响,因此采用失业率比较合理。分行政区来看,2010年失业率最高的前5位为门头沟、房山、石景山、宣武和通州;比例最低的前5位为大兴、崇文、东城、西城和海淀。从四大功能分区来看,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失业率高其他功能区,其次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的失业率最低。与2000

表3 2000和2010年北京按行政区分的常住失业人口及失业率的分布

地区	失业人口(人)		失业率(%)	
	2010年	2000年	2010年	2000年
东城	832	2565	3.5	9.5
西城	1168	3059	3.5	8.6
崇文	466	1716	3.2	9.4
宣武	1395	3158	5.1	11.5
朝阳	7677	7829	4.0	6.3
丰台	5092	4846	4.6	6.5
石景山	1630	1766	5.3	6.4
海淀	5829	6222	3.6	5.3
门头沟	1231	1179	9.5	8.8
房山	2503	1351	5.6	3.1
通州	3308	1150	4.8	3.2
顺义	2202	1051	4.3	3.0
昌平	3835	1621	4.4	4.8
大兴	2342	1449	3.1	3.8
怀柔	903	479	4.4	2.8
平谷	967	658	4.0	3.1
密云	1011	0	3.9	0
延庆	677	341	4.0	2.2
北京市总体	43068	40440	4.9	5.5
首都功能核心区	5491	12264	5.5	9.0
城市功能拓展区	18598	18897	3.8	5.9
城市发展新区	11687	5271	3.6	3.7
生态涵养发展区	7292	4008	7.1	3.0

注:根据北京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计算。城市功能分区依据《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门头沟、房山、通州、昌平、顺义、大兴区,其他4个区县为生态涵养发展区。

年相比,全市失业率的平均变动情况呈下降趋势,其中,下降速度较快的为宣武、崇文、东城、西城和朝阳;上升速度相对较快的有密云、房山、延庆、怀柔和通州。从功能分区的角度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失业率有所降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失业率有所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各区县失业人口增长的空间格局和失业率的空间格局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尽管各区县失业人口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但失业率整体呈大幅降低的趋势。

(二) 按乡镇街道分的北京失业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

从乡镇街道层面看,失业人口从2000年集中在中心城区街道发展为向五环外的郊区新城集中。2010年北京失业人口数量最多的前5位街道为东小口、回龙观、梨园、永顺和大红门,均位于五环外的郊区新城;最少的前5位为密云工业开发区、雁栖经济开发区、房山蒲洼乡、珍珠泉乡和石城镇,均位于六环外的远郊乡镇。而2000年失业人口数量最多的前5位的乡

镇街道为黄村镇、广外街道、白纸坊街道、德胜门外街道和东铁匠营街道,均位于中心城区的南部,最少的乡镇街道为远郊县城密云县的乡镇街道,失业人口数量为0。

失业率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失业人口的比重,特别是在各乡镇街道总人口数量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因此,本文从街道层面分析失业率的变化。2010年,失业率较高的乡镇街道有史家营乡、斋堂镇、王平地区办事处、清水镇和东辛房街道办事处,这些多是六环外门头沟、房山等传统制造业和采矿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失业率最低的乡镇街道为密云工业开发区、雁栖经济开发区、冯家峪镇、镇罗营镇和新城子镇。总体来看,2010年失业率较高的乡镇街道分散分布在远郊和近郊地区。2000年失业率最高的北京街道为东辛房街道、城子街道、将台乡、天桥街道和陶然亭街道,这些多是二环内的内城和南城地区,以及近郊城乡接合部和远郊工矿地区;失业率最低的为密云县的乡镇街道。总体来看,2000年失业率较高的乡镇街道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I)的计算结果显示,2000年 Moran's I 系数为 0.69;Z 值为 59.4,1%概率是集聚的;2010年 Moran's I 系数为 0.05;Z 值为 4.77,1%概率为集聚。这说明失业人口总体来看是相对集中的,2000~2010年出现了相对分散的趋势。空间相关的局部相关性分析也表明北京常住人口失业率的分布呈分散趋势。

三、北京失业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揭示了失业人口的社会经济和空间分布特征,下面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来分析失业的成因及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包括经济增长、总人口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以及就业需求方的特征、就业供给方的特征、户口和社保制度依赖、到就业中心的距离和可达性等因素。

2000~2010年,北京加快了市场化的进程,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转换,人口总量也快速增长,带来了总就业的增加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北京城市经济发展很快,人均GDP从24127元增加到75943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14倍。与此同时,北京市总人口增加了579万,外来人口增加了436万。总从业人员从2000年的619.3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031.6万人,净增加了412.3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例从2000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9.6%,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1990年该比例为44.9%;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比从2000年的54.6%上升到2010年的74.4%,增加了19.8个百分点。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数量从2000年的266.2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89.0万人,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例从2000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18.3%,而1990年该比例为57.1%(北京市统计局,2011)。由于第二产业的外迁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导致很多在第二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本地户籍的从业人员下岗。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实行了“优二兴三”战略,将城区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到1998年底,北京城区共搬

迁了工业企业 170 多家(北京卷编辑部,2010)。这表明,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就业需求的增加,经济结构的转换引发了就业结构的调整,由于总就业人口增长超过了总就业需求,以及就业结构的转换导致了失业。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这些本地户籍的失业人口与常住外来人口相比不具有竞争优势。他们多为本地非农业户口,年龄偏大且学历偏低。他们以前在制造业积累的工作技能不能完全适用于第三产业。2008年北京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中,国有和集体单位占 10%,60%为各类私营企业。一些调查结果表明,从企业用工成本来看,私营企业雇主更愿意雇用常住外来人口而不是本地人口。因为雇主认为北京本地人口用工成本高,需要缴纳“四险一金”,外来人口则可以少缴或不缴,而且外来人口工作更勤奋,更好管理。从个人效用看,非农业户籍本地居民可以申请低保和保障性住房,而且他们大多住在保障性住房、享有社会保险或低保,其失业成本和就业意愿较低,更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以 2010 年为例,北京城镇低保居民为月人均 430 元,实物配租缴纳廉租房租金为收入的 5%,此外还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这说明他们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无须就业。只有一部分常住外来人口交纳了失业保险,大部分外来人口失业时没有失业保险赔付和政府提供的失业救济金,因此失业的损失更大,流动性更强。一些劳动密集型岗位更多地由常住外来人口占据,替代了本地户籍人口。

从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来看,特定区域的就业岗位减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及区位到就业中心的可达性差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结合失业人口的集中分布区位来看,2000 年的失业人口集中分布在北京城区西部和南部的三环到五环之间,这些区位是传统制造业和污染性工业企业分布集中的地方。在企业改革进程中,工厂停产、职工下岗(北京市 1998 年开始出台下岗政策)导致这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失业人口的空间集聚。2010 年的北京失业人口更为分散地分布在五环之外的近郊新城或者远郊乡镇,相对集中的区域大多是集中建设的拆迁安置和保障房小区,这些地方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且公共交通不便利。这些地区本身的就业机会少,一些由于停止采矿和企业关门导致就业机会更少,如门头沟和房山等乡镇;另一些作为大型的“睡城”,本身的就业机会较少,如回龙观等地区;到城区就业中心(CBD,金融街,中关村、亦庄)的就业可达性较差。从街道单元对比来看,2010 年东小口、回龙观、梨园、永顺地区失业人口明显增加,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北京拆迁安置、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集中的地区,这很可能是集中建设的保障房汇集了大量失业人口,也可能是由于保障房的就业可达性差造成了新的失业人口。这说明地区的就业岗位需求、可达性和拆迁安置等造成劳动力供给的集中是区域性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这 10 年失业集中地区发生了转变,主要是由于 2000 年的失业人口分布受国企集中改制的影响,2010 年则受郊区拆迁安置房和保障房集中建设,以及郊区的就业可达性差的影响。2010 年北京市人口就业依然集中在中心城区,而居住却向郊区推移,这与美国城市的空间失配

模式不同。

为了检验就业需求方特征、就业供给方特征、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依赖、到就业中心的距离及可达性对失业的影响,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由于2000年的数据缺失变量较多,下面以2010年分街道的常住人口失业率建立回归模型,模型因变量为分街道的失业率。模型自变量包括:(1)各街道40~5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这是失业人群最集中的年龄段。(2)各街道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用来检验失业人口性别特征的影响。(3)各街道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用来检验失业人口技能特征的影响。(4)各街道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用来检验失业人口的户籍的影响。(5)各街道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用来检验人口疏解政策的影响。(6)各街道居住在保障房的家庭占总家庭户比例。这里采用居住在保障房(购买经济适用房和租赁廉租房)的家庭比例,用来检验失业人口的住房保障和低保的影响。(7)各街道劳动密集型行业岗位供给比例,检验就业需求方的影响。本文根据劳动密集型行业定义和北京的实际情况,确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岗位数据来自于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8)各街道几何中心到达天安门距离。用来检验失业人口的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心城区(城八区)距离天安门越远,失业率越高,并且统计显著;近郊六区和都

市区距离天安门越远,失业率越高,但统计不显著;远郊四区距离天安门越近,失业率越高,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从全市来看,距离天安门越近,失业率越高,并且统计显著。从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关系看,北京的就业中心集中在市区,居住地集中在郊区。在都市区、城八区和近郊六

表4 回归结果

自变量	2010年				
	城八区	近郊六区	远郊四区	都市区	全市
常数项	10.160**	10.442	10.060	8.447	12.946*
到天安门距离	0.036*	0.012	-0.017	0.016	-0.038*
40~50岁人口比例	-0.187	0.164	-0.280*	0.053	-0.020
女性比例	0.004	-0.119	-0.022	-0.054	-0.108
大专以上人口比例	-0.078***	0.000	-0.029	-0.040	-0.055*
外来人口比例	-0.059***	-0.032	0.010	-0.037*	-0.045*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比例	0.061***	0.011	0.128*	0.052*	0.075*
保障房家庭比例	-0.001	0.017	0.462	0.011	-0.011
劳动密集型岗位比例	0.012	-0.043*	0.001	-0.023*	-0.005
R square	0.387	0.142	0.543	0.154	0.111
F(Significant)	9.860***	2.207*	8.897***	5.473***	4.134***
Durbin-watson	1.718	2.060	2.135	1.888	1.617
Sample	136	118	71	254	325

注:城八区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都市区是指市域内除了平谷、怀柔、延庆和密云远郊四区县以外的14个区;近郊六区为除了城八区和远郊四区之外的区。*p<0.05,**p<0.01,***p<0.001。

区距离天安门越远,意味着距离就业中心越远,因此,都市区外围的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可达性差是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而在远郊四区,各区县城作为单独的就业次中心,失业人口更多地分布在县城及其附近,更偏远的农村地区失业人口更少。人口特征中,在远郊四区各街道40~50岁人口所占比例越高,失业率越低,并且统计显著。在都市区和近郊六区各街道40~50岁人口所占比例越高,失业率越高,但统计不显著。这可能是尽管失业人口中40~50岁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但与街道该年龄人口比例关系不大。除了城八区,近郊六区、远郊四区和都市区女性比例越高,失业率越低,但统计不显著。除了近郊六区,城八区和全市均为大专以上人口比例越高,失业率越低,且统计显著,远郊四区和都市区该符号为负,但统计不显著,这说明人口技能对失业有显著影响。

城八区、都市区和全市均是街道外来人口比例越高,失业率越低,且统计显著,这说明户口及依附的社保对失业产生了影响。在城八区、远郊四区、都市区和全市均是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比例越高的街道,失业率越高,且统计显著;而在近郊六区,尽管统计不显著,但支持拆迁安置是失业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各街道保障房家庭比例的影响统计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早期的经济适用房对象定位并不都是中低收入家庭有关。在近郊六区和都市区2008年劳动密集型岗位越多,失业率越低,说明地区劳动密集型岗位需求对失业有明显的影响。

四、结论、讨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2000~2010年北京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的变化和空间分布趋势。与2000年相比,北京失业人口出现了缓慢增长的趋势,失业率相对下降。北京失业人口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北京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相对集聚,出现了相对扩散的趋势,从2000年集中在中心城区转移到2010年集中在郊区,高度集中在特定的乡镇街道。失业率的分布也是如此。

从失业的成因和空间集聚的原因来看,城市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总就业人口的增加,就业结构的转换带来岗位需求的转变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较快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由于部分本地劳动力供给方的受教育程度低,在传统行业积累的技能无法适应和应用到新发展的行业,与大量增加的外来人口在竞争中处于成本劣势,加之他们存在住房和社会保障的制度依赖,造成了其失业成本低和失业风险高。从空间的成因来看,在2000年传统行业迁出和就业结构转换的城区乡镇街道失业率更高,主要是就业需求的急剧转变和劳动力供给方还不能适应工作市场的转变造成的;在2010年郊区拆迁安置和保障房集中建设社区和衰败的工矿业集中的乡镇街道失业率更高,主要与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太少,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及到就业中心的可达性较差有关。

与西方城市相比,北京的失业者具有类似的年龄大和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本地户籍);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2000年集中在工业迁出和国企改革集中的城区,2010年集中在拆迁安置和保障房集中建设的郊区,以及工矿业

衰落和就业机会少的郊区。这与郊区就业岗位有限、可达性差,以及低收入人群的技能不能适应行业转型的发展需求有关。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对个体而言,需要提高失业者的就业技能,减少对保障房和社会保障的依赖;对地区而言,需要提高郊区到就业中心的可达性,加强郊区拆迁安置和保障房社区周边的产业发展来增加就业机会。这意味着现有政策还需要加强对失业者的就业培训工作,并在税收和失业补贴、社会保障(含住房保障)、职业教育培训等方面统筹设计,降低社会保障和家庭总收入的关系,减轻社会保障等对就业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在就业需求发生转变和失业者集聚的地区要增加就业的可达性。例如,优化现有交通网络,降低通勤时间和成本;采取产城融合的思路,将拆迁安置和保障房集中建设的社区和产业园区综合配置,或者在这些社区配套一些适合中低收入家庭就业的岗位。

参考文献:

1. 北京卷编辑部(2010):《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 杜鑫(2010):《北京市城镇劳动力失业的经验分析》,《中国市场》,第40期。
3. 薛惠元、刘玉娟(2005):《武汉市失业人口与失业率特征》,《人口与社会》,第3期。
4. 杨伟国(2006):《我国的失业群集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5. 王德文等(2004):《迁移、失业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什么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很低?》,《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6. 张车伟(2003):《失业率定义的国际比较及中国城镇失业率》,《世界经济》,第5期。
7. Mouhammed A.H.(2011), Important Theories of Unemployment and Public Policies.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and Economics*. Vol.12(5):100-110.
8. Gobillon L., Selod H., Spatial Mismatch (2012), In: Susan J. Smith, Marja Elsinga, Lorna Fox O'Mahony, Ong Seow Eng, Susan Wachter, Chris Hamnett, editor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ousing and Home*. 5-11.
9. Kain J.F. (1968), Housing Segregation, Negro 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2):175-197.
10. Richardson P., et al.(2000), The Concept, Policy Use and Measurement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Estimating a Time Varying NAIRU across 21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250.
11. Zenou Y. and Smith T.E.(1995), Efficiency Wages,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5(4):547-573.
12. Zenou Y.(2000), Unemployment in Cities, In: J-M. Huriot and J-F. Thisse(Eds.), *Economics of Citi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3-389.

(责任编辑:朱 犁)